

跨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文化

Dialogue Transcultural

执行主编 钱林森

对话

13

文化差异与多元交流

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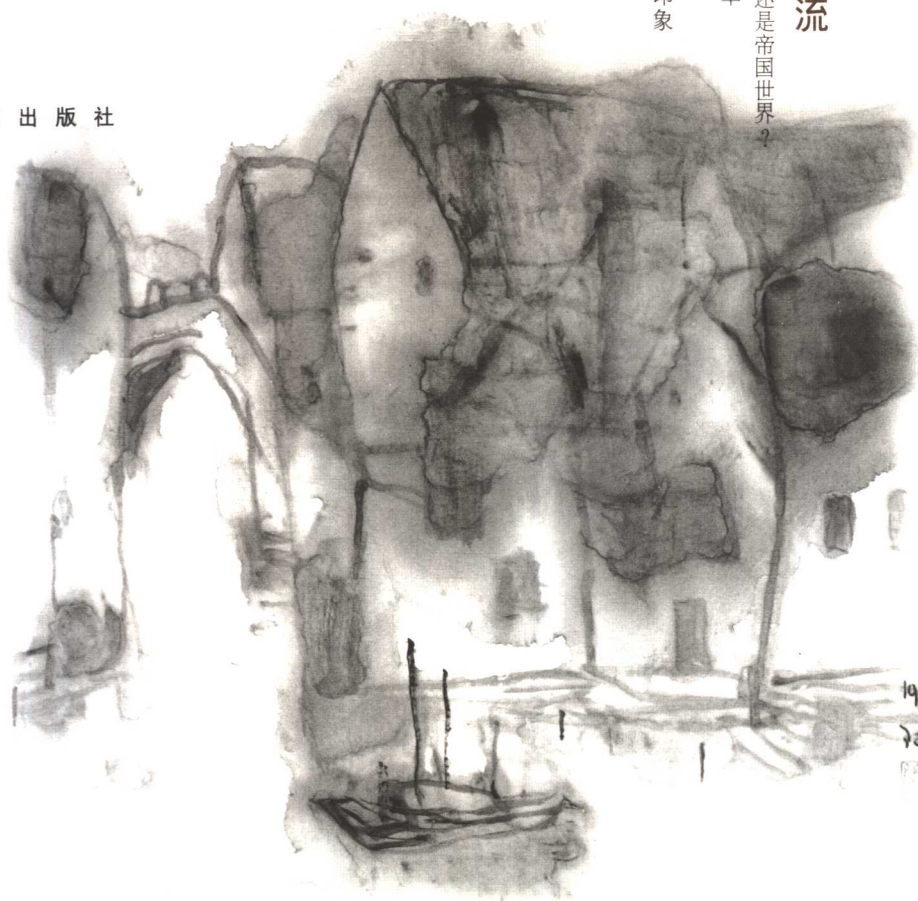
华人大学的理念与北大的改革

关于文字书写的笔谈

一群印度人第一次来中国的印象

他山之石也奇崛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跨

文化对话

13

上海文化出版社

9

7025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对话 13/乐黛云等 主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11

ISBN 7-80646-564-2

I. 跨… II. 乐… III. 比较文化-研究-文集 IV.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957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陆震伟

题面图:黄阿忠

跨文化对话 13

乐黛云等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640×935 1/16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6-564-2/G·345

定价:1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401196

《跨文化对话》

由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
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

并列入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

面向未来的文化间文库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网址：

www.pku.edu.cn/academic/ccs/

《跨文化对话》编辑委员会成员

主编 乐黛云教授(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电话与传真:(010)62752964 E-mail:Tyiydy@pku.edu.cn

主编 李比雄研究员(Alain Le Pichon,欧洲跨文化研究院)

通讯地址:5 Place Pierre Brossolette Severs, 92310 France
电话:0033 - 1 - 44078959 E-mail:lepichon@wanadoo.fr

执行主编 钱林森教授(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025)6206233 传真:(025)3309703

E-mail:linsenqian@hotmail.com

执行副主编 赵白生副教授(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

电话:(010)62754160 传真:(010)62755009

E-mail:bszhao@pku.edu.cn

执行副主编 郝铭鉴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021)64372608 传真:(021)64332019

E-mail:csbcm@publicl.sta.net.cn

**编委会巴黎联络处主任 金丝燕博士、副教授(法国阿尔德瓦大学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

通讯地址:15 Rue Victor Cousin, 75005 Paris, France

电话:0033 - 1 - 56240483 传真:0033 - 1 - 56240921

E-mail:jinsiyan@fph.fr

执行编辑 李国强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021)64372608 传真:(021)64332019

E-mail:Liguoqiang46@yahoo.com.cn

目 录

专论

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

[法]埃德加·莫兰(1)

海外专递

文化差异与多元交流

[意大利]恩贝托·埃柯(13)

大学改革论坛

“文化民族主义”、“挫折感”与中国学人的精神使命

张旭东(20)

华人大学的理念与北大的改革

甘 阳(31)

大学:制度背后的天才与刀剑

——以牛津大学为例

林国华(41)

北大:一次变革的精神困境

林国荣(54)

圆桌会议

关于文字书写的笔谈

西方的表意文字 [法]保尔·克洛代尔(66)

中国表意文字 [法]亨利·米修(74)

中国:作为科学的书写 [法]朱丽娅·克里斯特瓦(79)

中国文字:法国作家世纪性的命题 钱林森(86)

西方作家与汉字 秦海鹰(106)

克里斯特瓦关于中国文字的符号学阐释 罗 婷(110)

前沿碰撞

用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理论解析“文革文学”的错位

丁 帆等(122)

说东道西

文化身份的重构问题 [加拿大]张裕禾(139)

环球随笔

一群印度人第一次来中国的印象

[印度]马可仁·帕冉嘉普(153)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忆顾城与谢烨

[法]陈力川(164)

要籍时评

他山之石也奇崛

——评《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陈晓明(173)

探险与证词

——读程抱一的《对话》

车槿山(184)

超越全球化与发展：
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

[法]埃德加·莫兰

一、多元的世界化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化,其实是 16 世纪便已开始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最后一步。这一进程从西欧发现美洲大陆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势力开始,体现了一个双重的全球化:一个是猎取、奴役和殖民的全球化;另一个稍迟一些,也更艰难,同样来自西欧,那就是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民主的理念、国民生存权和国际主义在全球的发展与弘扬。这后一个全球化与前一个既相联又对立。

由于西方文明在造成野蛮的同时也发明了化解野蛮的药方,这个药方虽然微不足道并时时面临威胁,还是从内部瓦解了奴隶制,给受压迫的人们带来了解放的意识,进而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引发了非殖民化。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悖论,它在争取女权中再次得到印证;统治持久的巢穴,往往正是解放的源泉;同样,人们需要同西方帝国主义斗争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

90 年代的全球化表现在“统治—解放”的双重过程中,并给这一过程带来了新的特征。苏联极权政体的瓦解及国家官僚主义经济的失败既推动了各大洲民主化的进程,也促进了在经济自由主义庇护之下的市场向全球的扩张。同时,在惊人的信息传播、地盘占领中(不只是地理概念的,也是社会的,如战略服务市场;生物

领域的,如转基因),资本主义被充实了能量。商业经济充斥了人类和自然的所有领域。与此相应出现的是高速通讯网络的世界化(移动电话、传真、因特网),它使世界市场活跃起来,而后者又给这一网络的世界化注入了活力,两者相辅相成。

因此,90年代的全球化在推动技术经济世界化的同时,促进了另一个世界化:它是人道主义的和民主的,是未完成的,不充分的,脆弱的,它所面对的种种阻力中有殖民主义的后遗症、严重的不平等和对利润的疯狂追求。

二、社会世界

全球化可被视为经济技术一体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同时也可被视为社会世界的雏形,虽然其发展既不均衡也无秩序。

社会拥有通讯系统。现今世界也拥有一个全球的交通通讯网络(飞机、电话、传真、因特网),而且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社会如此完备地拥有过它。

社会拥有经济。现今经济已是世界性的,只不过还缺乏一个像有组织的社会那样的约束机制(法规,法律,监督);至于现有的世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机构,则远不具备进行必要调节的能力。

社会与文明不可分离。现今世界已拥有一个世界文明,它源于西方文明,是其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

社会内部可以包容多元文化,但同时也要形成其独特的文化。现今世界存在着各种跨文化潮流,它们浇灌着各种文化又超越了它们,从而形成了一个准世界文化。混血儿、异族通婚、双重文化人(名作家鲁士迪 Rushdie,阿尔淳 Arjun,阿巴杜拉 Appadura)以及四海为家的人们都在不断地充实这种跨文化。

20世纪中叶,大众媒体制造、混合出了一个世界民众艺术,它从各种不同文化中间撷取不同的主题。

电影、歌曲、摇滚及电视方面的文艺作品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本来是由利益趋动,特别是在好莱坞,其分工几乎是工业性的,然而在粗制滥造和循规蹈矩的同时,却也生产出了别具一格的作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都曾有过也继续产生着创造性的活动,正如我在《时代精神》一书中所说,人们无法长时间生产千篇一律的电影或歌曲,每个人必定有他的独创之处,生产本身必然呼唤创造。虽然生产有时会窒息创造,但也提供杰作显现的机遇。电影艺术在各大陆开花结果,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并且保留了艺术家的独创精神和各种文化的风格……

全球性民众音乐已经形成,并在各种交流与相遇中充实丰富起来。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爵士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融合创新。从新奥尔良出发,爵士乐在全世界普及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出现了探戈,古巴有莽姆波舞,维也纳有华尔兹,而美国的摇滚乐本身就是世界各地不同风格音乐的融会产物。世界民众音乐还接纳了印度的六弦琴,安达卢西亚的民间舞曲,乌姆—卡尔松的阿拉伯—希腊谈唱,安第斯的瓦伊诺山歌。这一混合产生了另一些民族性新型音乐,如热情的非洲—古巴音乐萨尔撒(salsa),阿拉伯民间歌舞哈依(rai),安达卢西亚摇滚。

一涉及到艺术,包括音乐与绘画、文学与思想,文化的世界化并没有被同质化。艺术在跨文化的大潮中创新,而跨文化相逢又激励各民族文化在其内部的独创性表达。多文化混合的结果总会重新创造出多样化,同时鼓励彼此沟通。爵士乐原先只是新奥尔良地区的非洲—美国混合音乐,后来在美国流行,产生不少变种。新风格从未扼杀过老式爵士乐,最终成为黑人与白人共享的音乐。白种人不仅听爵士乐、跳爵士舞,还演奏爵士乐的各种形式。爵士乐传遍全球,老式的“新奥尔良”风格(New Orleans)在它的出生地受到冷落,却在巴黎的圣日尔曼—代普雷(Saint Germain des Près)的咖啡馆地下室里生机勃勃。随后它又回到美国,重新在新奥尔良定居,世称“新奥尔良复兴”(New Orleans Revival)。另外,在节奏与布鲁斯忧郁曲(rhythm and blues)相遇之后,摇滚乐(rock)在

美国的白人世界里流行开来,然后传遍全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演唱,并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性。今天,在北京、广东、东京、巴黎和莫斯科都可见到人们跳摇滚,用摇滚相互沟通。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可以同一个节奏在同一个星球上展翅飞翔。

摇滚乐在全世界的风行推动了其他新的混合音乐的形成,如前面提到的哈依阿拉伯民间音乐,并在合成摇滚(rock - fusion)中形成了某种节奏的声浪,全世界的音乐文化都在那里耳鬓厮磨。这种文化混合会良莠不齐。然而无论如何,音乐不会迷失。世界的音乐文化便如此相互交融,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它会造成怎样的未来地球儿童。

另外,像所有社会都有“地下组织”一样,90年代以来,一个黑社会网络已在全球形成(特别是贩毒与卖淫)。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更向世人昭示了世界性恐怖组织的存在,它以自己的方式显示了社会世界的出现。为了消除世界化,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却在促发社会世界的形成,它试图建立自己的警察与宪兵,而且它能够也必然会去制订一个全球的“文明政治”。

最后,我们可以说,20世纪末完成的主权民族国家的世界化赋予全球文化与文明以共同特点;但正是这一世界化将世界进一步分割开来,以至于国家的绝对主权成为阻碍社会世界形成的原因。既是解放者又是压迫者的国家,使联盟的创建变得十分艰难,而这些联盟在满足各地区的生存需要上是必不可少的。且不论一个全球性联盟的诞生将是何等不易。

因此,地球作为版图已拥有了通讯系统,拥有了经济、文明和文化,却还缺乏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如政府治理(gouvernance)、公民意识、权力制衡,以及缺乏一种属于地球祖国的共同意识。

事实上,地球没有组织,没有针对经济、政治、治安和环境设置的法律、权力和调节机构。联合国不可能成为一个超国家的权威,其内部否决权机制会使它运转不灵。我们缺乏可以让社会世界监督其经济的法庭,日本京都的大会也没有能够成立一个保护环境的法庭。最后,社会世界也必须有一支国际军队和国际警察。

我们还缺少一个世界性的公民社会,而我们自身作为地球祖国的公民之意识还很凌乱,处在某种萌芽状态。

简而言之,我们拥有的是下部结构而非上层建筑;我们有的是硬件,但还缺少软件。

三、地球公民意识的浮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1999 年以来地球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正在初步成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

20 世纪中叶,加里·大卫(Gary Davis)和罗内·马尔尚(René Marchand)就已经创立了世界公民国际协会,虽然参与者凤毛麟角,却一直体现着全球一体的渴望。

70 年代以来,地球公民社会的先驱者们创立了无疆界的人道主义医生协会,打破种族与信仰的界线,到世界各地去救死扶伤。

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人权,揭露任意监禁与酷刑。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致力于保护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物圈。

国际幸存者组织在拯救濒临灭亡的弱小文化与族群。

还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人类的各个领域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争取妇女平等权利方面。

然而,1999 年 12 月,公民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那就是反西雅图经济技术全球化的示威。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在那里,“世界不是商品”。人们意识到,不仅需要对世界性的问题给予世界性的回答,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压力并提出动议。西雅图引起了另两次聚会,一次在巴西的波尔图·阿莱阁(Porto Alegre),最后变成了新生的世界公民社会论坛;另一次是以地球祖国的名义在美国的伍德斯多克(Woodstock)召开的集会,全世界六万人与会,成为一个集体庆典。

接下来的还有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由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于 2001 年 12 月在法国里尔召开。为期十天的大会召集了各大陆七百多名公民。与会者以极大的热忱,反复讨论,提出了一

篇《人类责任宪章》草案。

2001年3月,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费德里哥·马约(Federico Mayor)建议创立“世界公民社会网络之网络”,命名为玉盘都(Ubuntu,非洲口语,意为人类)。它于2002年3月开会成立了“民主的可管理性测验组”,目的在于对“国际机构的深层改革”。

最后,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的提议下,2001年10月在非洲的布莱德(Bled)召开了一次会议,之后,于2002年2月成立了一个“伦理、政治和科学的国际学会”,旨在“监督与警戒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其中特别关注的是生态危机、经济与金融失控、“观念与思维的匮乏”,为的是给出“公民与伦理的回应”,这些回应中包括推动世界公民社会产生的必要性。

此外还要加上跨国际的共同体情感,特别表现在青少年文化和妇女活动的世界化方面。可惜的是,国际工人团结的组织却正在日渐消亡。不过他们的精神正通过各种渠道在世界各地发扬,虽然还很分散,但却很有意义,为逐渐出现的公民社会作了准备。公民社会的形成应当是未来社会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四、与“发展”决裂

要建成一个社会世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霸权帝国,而是需要一个文明开化的联盟基础;所缺少的不是规划,也不是设计,而是能够指引道路的原则。

这里便涉及到我曾提出的全球“人类政治”(anthropolitique 或 politique de l'humanité)以及“文明政治”(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的概念。首先我们需要解析“发展”的概念,也包括那些被修正过的概念,诸如“可持续性发展”、“可行性发展”或“人类发展”等。

“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它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其成功的模式便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西方社会目前的状况便成了人类历史的

目标和终极目的。

至于“可持续发展”，仅仅是生态环境压力下暂缓发展的一种考虑，并未挖掘发展逻辑的根源。而在“人类发展”这一提法里，“人类”这个词十分空洞，它最多也只是指西方的人文模式，其中当然包含一些积极因素，但我们不妨再说一遍，也包含了一些根本的消极因素。

“发展”这一表面看来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构建的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神话。它是一架疯狂的西化发动机，一个北半球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南半球）的殖民工具。正如赛尔日·拉杜什（Serge Latouche）所说：“正是应当对这些西方的（发展）价值重新进行评价，才能找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答案。”（《外交世界》2001年5月）

“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它唯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产品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货币收入的增长）。由于仅仅以数量界定，它忽视质量，如存在的质量，协助的质量，社会环境的质量及生命的质量。另外，国内生产总值（PIB）将货币流通中的所有增值现象都统计为正数，甚至包括诸如艾里卡（Erika）沉船事故或1999年的（西欧）大风暴灾害，忽略不计那些无偿的公益活动。发展的量化理性实际上是最不合理的。

“发展”的逻辑忽略了经济增长给人类带来的道德的和心理的迟钝：过度专业化的普及，各领域的隔绝，极端个人主义，利欲熏心，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丧失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发展”造成知识的专门化，以至于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发达国家的专业教育确实教会人们很多知识，但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

“发展”本身带着所有西方文明中可疑的、有害的、消极的因素，虽然也包含着少量的积极概念：如人权、个体责任、人道主义精神、民主等。

“发展”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

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欠发展”(sous - développement)这一漫不经心的粗野提法将人类文化智慧与人生艺术贬得一钱不值。

“发展”当然给人们带来了科学的、技术的、医学的和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对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果是新的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可持续”或“可行性发展”的说法虽然可以减缓或削弱这一破坏进程,但却不能改变其摧毁性的结局。

“发展”所无视的还有:真正的人类进步不可能从今天开始,而是要向类属人类(hommegénérique)的潜在性回归,也就是再生(régénération)。同人机体内部拥有全能再生细胞(totipotents)的道理一样,人类也拥有它自身的再生原则,正是这些再生原则才能让人类进步。可惜的是,它们仍沉睡、关闭在各种专业和社会僵化的体制之中。

最后,以西方文明的模式、理想和目的为参照的“发展”逻辑,忽视了西方文明自身正在危机当中。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在城市的技术与工业的兴旺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而“发展”所产生的力量将把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

五、创建“人的政治”

我认为,发展的概念应被我很久以前建议过的“人类政治”和“文明政治”所取代。

人类政治最紧迫的任务是使全人类协力互助。

因而应设立一个有公信力的联合国事务部,它应拥有一笔基金,专为穷苦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使用。这一事务部应设立一个国际免费医疗中心,用以治疗艾滋病及其他传染病;一个国际食品中心,救助处于贫困饥馑中的人们;一个用于辅助民间人文组织的实体。富有的国家应发动广大青年到世界上那些灾害地区

(如旱灾区,水灾区,传染病区等)提供公益服务。

仅仅依据收入无法计算贫穷,更重要的还有穷人所遭受的不公正,他们不仅在营养不良和疾病面前被剥夺了权利,同时也被剥夺了受尊重的权利。被剥夺意味着在轻视、愚昧和厄运面前无能为力。“贫穷”所包含的远远比这一词本身广泛得多。也就是说,贫困的本质问题不可能用货币来计算和测量。

人类政治应当同时是一个建设、保护和监督全球共同财富的政治。这些共同财富很有限,应该对其进行控制,比如水资源,包括地下水的保持及其引流,还有控制石油矿藏的开采。

人类政治应当相应地成为所有人的正义政治,特别是之于广大的非西方人,他们一直被排斥获得应有的权利,这一点连西方人自己都承认。

文明政治的任务是吸取西方文明之精华,去其糟粕,通过融合东方与南半球文明的重大贡献而创造出文明共生的局面。这一文明政治对西方本身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算计,受制于攫取利益的技巧,数量凌驾于质量之上,人口密集地区的生活质量下降,工业化种植和养殖使乡村荒漠化,而且造成了严重的食物危害。悖论在于,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它的完全被揭示却是它自身的贫乏。

人类政治与文明政治应该在全球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地球这个宇宙行星被四个既相关又不受控制的动力所推动:科学、技术、工业与资本主义(利润)。困难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对这四个动力的监控系统,因为科学、技术与工业的权力应受伦理的监控,而伦理监控又只能通过政治机制来实施;经济不仅需要调节,还应变得多样化,包括互助、协会、合作及服务的互换。

因此,为了解决重大问题,应付危难事件,社会世界应当制订出人类政治与文明政治。为此它需要有治理艺术(gouvernance)。目前我们缺乏一个全球的治理艺术。不过,各民主社会已在作准备,有时是以非民主的方式在进行,即强制性推行改革。

这一全球治理最好是从联合国作起,使自身变成邦联,其途径是创立各种全球决策机构,它们有能力解决重大问题和应付危难事件(核武器与生物武器,恐怖主义,经济,生态,文化)。但欧洲的例子告诉我们,此类进程会非常缓慢,它需要各方面的共识。也许只有经过极端的灾难或危机之后,才能产生电击效应,使得人们有所觉悟并作出决策。

也就是说要引导人们提高全球公民意识,认识到世界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联合国规模的扩大。

在倒退、崩溃、灾难与混乱中,地球祖国出现在地平线上,不是为了取代各自的祖国,而是使之包含在它自身的涵义中。

六、障碍来自人类自身

我们刚刚描述了理性与人道的社会世界之蓝图,使人觉得仿佛只要遵循理性和人性便可将它建立起来。但我们很快就发现阻挡其形成的障碍也是巨大的。

首先,社会世界的统一趋势引起了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抵抗,它们只想瓜分世界以便从中牟利;而要消除这些抵抗因素,就得借助某种无情的统治。

然后是民族国家、全民精神和觉悟的不成熟,即人类整体上说根本还未成熟,远没有自我实现。

而且,不仅仅是现今世界有利于对利益和权力的角逐,有利于野心和无限开发欲的膨胀;不仅仅是文化冲突强化了盲目的狂热,同时也还有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世界各地的社区主义,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齐头并进,成了加剧人与人之间隔阂的罪魁祸首。一方面,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在原则上有利于相互理解,然而这种人道主义一旦遇到同其他社会的对立便会退缩。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利于助长自私主义、鼓励个体利益和自我辩护,而相对地忽视对他人的理解。由此造成了在家庭、群体和工作单位中的有伤害性的隔阂。甚至那些向别人传授理解的人,比如教师,也难逃窠臼。另一方